

国家政治认同下的黄帝崇拜

牛锐

“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这是清末台湾爱国士绅邱逢甲在《落叶恋本根》中吟诵的诗句。古往今来，每逢清明，国人都会以各种形式祭奠圣祖先贤。对黄帝的祭祀，既是缅怀先祖的民族寻根仪式，又是表达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价值追求、价值理想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出现重大民族危机之时，以黄帝崇拜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更是激发出强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

古代：服务于“大一统”的“五帝之首”

历史上关于黄帝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据学者研究，有关黄帝的传说，最早可能是见于成书于西周的《逸周书·尝麦解》，书中记载着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故事。对黄帝的祭祀又是什么时候兴起的？王国维编撰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上说：“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究竟有无左彻其人、有无左彻祭祀黄帝其事已无从考证，但是，对黄帝的祭祀可以追溯到黄帝去世以后不久、对黄帝的崇拜兴起于战国时期的观点，已经为许多人所接受。

战国以后，为了证明各自政权的合理性，各国的上层贵族、士人先后制造了自己祖先的谱系，并将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黄帝作为自己的始祖，出现了“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的局面。对于这一现象，中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完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游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阻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

秦汉时期，随着多民族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黄帝崇拜所具有的政治性日益强烈。《史记》在其开篇的《五帝本纪》中，把黄帝列在“五帝”首位，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帝王是黄帝子孙，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也是黄帝之后，匈奴、闽越等的“蛮夷”亦被视为黄帝苗裔，各族都被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之中。《史记》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汉族普通人家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黄帝，各少数民族政权祖述黄帝者也不胜枚举。据《晋书》记载，前秦皇帝、氐人苻坚“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人慕容“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后秦政权的开创者、羌人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建立了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北史·魏本纪》说：“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在唐朝史官的笔下，稽胡、库莫奚、突厥这些民族都是黄帝后代的分支。元朝修《辽史》时称，“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第一次实现了中国游牧区与农耕区完全统一的元朝也充分体现出对黄帝的尊崇。《元史·祭祀志》载：“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清代对黄帝的尊崇更是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 10 帝中除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黄帝陵，致祭次数远胜前朝。

如此众多之人均自称黄帝之后，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世人对以黄帝为核心

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自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境内各族祖先黄帝谱系的形成，是为“大一统”的政治服务的，是“皇统”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浸润下，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单位，经过数千年的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越来越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延伸阅读

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信仰，共同点是：圣明、仁德、益民、和平、功业盛大。先民在塑造五帝形象的同时，其实就是在铸造中华民族的品格，其核心是民本、贵和、创新。……黄帝是人不是神，但他是文化英雄、中华圣人，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团结前进。我们不能不对以黄帝为代表的先祖开拓中华文明的功德表示感恩和敬意，我们以有这样的先祖而自豪。当然，有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较晚，并不都在祖源上认同黄帝，这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勉强的。不过黄帝信仰一直是中华民族祖源认同中的主流意识，黄帝成为共祖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弘扬黄帝文化时保持一份清醒，并会着意阐释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牟钟鉴《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近代：从“汉族先祖”到“中华民族共祖”

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一份创办于近代的中国同盟会刊物——《民报》。其创刊号首页是一幅黄帝像，图释写着“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与同时代刊物不同的是，《民报》既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帝王年号纪年，也没有采用西方的耶稣纪年，而是使用了黄帝纪年，把创刊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定义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一幅画像、一句图说、一种纪年，昭示出黄帝崇拜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华不断升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反省与检讨。这种自我反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这一“自我称谓”的探索；二是在新的史学意识激励下，重新建构中国的历史。而这种探索与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唤醒全体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对内推翻满族贵族的封建统治，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重构，体现出其对“国族”主体平民力量的关注。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呼吁国人致力于新史学的撰著，以鼓吹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在梁启超的号召下，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国民史学”的建构，中国的历史被转化成“国族”发展的历史。在这一风潮之中，被历代奉为“皇统”标志的黄帝，其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在明代王圻编纂的《三才图会》中，收有一幅黄帝画像，黄帝头戴冕旒、身着黻服，俨然帝王气象；在上世纪初，《江苏》、《黄帝魂》、《国粹学报》、《民报》等杂志所先后刊载的同一幅黄帝头像中，黄帝却是头戴布冠，与平民无异。在国族化进程中，黄帝从皇统的帝王至尊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先祖。

然而，当时人们对黄帝所代表的国族的范畴却有不同认识。康有为认为，“国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久为中国正统矣”，应使汉、满、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团和大群，以强中国”；章太炎则强调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观念，提出“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主张中国国族仅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这种以血统来划定国族边界的做法，显然是与当时革命党“排满”的实际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的，因而在当时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

“尊黄”运动虽然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汉民族意识的觉醒，却缩小了黄帝的代表范围，宣扬了大汉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中华民族的团结。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尊黄”和“排满”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人们对此也逐渐加深了认识，渐渐地趋向于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

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孙中山委派了一个由 15 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陕西祭黄帝陵。他在亲笔题写的祭文《黄帝赞》中写道：“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至此，“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黄帝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先祖。

延伸阅读

“国族”作为一个“想像的社群”，无疑是近代的产物。不过，进行此一想像的行动者，却往往将其眼光投注于渺远的过去，企图为国族的起源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黄帝，在晚清中国，便是在此需求下，经由一套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夺占、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然而，以黄帝符号为中心所塑造出来的中国国族，却囿于晚清反满革命的政治现实，而只能是一个以血缘之根基性联系为本质，并具有高度排拒性的族群团体。……因而，从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政治、文化条件分析，“黄帝”此一高度建构性的符号，也正是各项现实利益与势力对抗、争持的场域。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现代：共御外辱的民族符号

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轩辕庙里，有 4 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西侧两座，前边是毛泽东所作《祭黄帝陵文》，后边是邓小平在上世纪 80 年代题写的“炎黄子孙”4 个大字；东侧两座，前边是孙中山书写的祭文《黄帝赞》，后边是蒋介石所书“黄帝陵”3 个大字。其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于 1937 年和 1942 年题写的祭文和题词，唤起了人们对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记忆。

1937 年清明节，正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迎来了一场由数千人参加的特殊公祭——经历 10 年对峙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派代表共祭祖先。在这个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历史时刻，黄帝成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

在《祭黄帝陵文》（又名《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中，毛泽东呼吁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其中“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正是祭文的要旨所在。国民党也在祭文中提出了“保我族类”、“同心一德，化灾为祥和”的主张。这次公祭对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 年 8 月 25 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1937 年到 1943 年清明节前后，国共双方均派人赴陕西黄陵参加祭礼。其中，1938 年 4 月 4 日，国共双方再次共同祭陵。在众多祭文中，书写着“振民族之精神”，“金瓯无缺，光华复旦”，“民族复兴”这些表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念。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宣传同为黄帝子孙、共御外辱的主张外，学者们也纷纷以笔代枪，弘扬黄帝伟绩、激励抗战士气。1938 年 2 月，陈子怡在《西北史地》上发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论证中华民族与黄帝子孙二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一些观点及论证虽然未必精当，但其“中华民族之名，与其谓为种族之称，毋宁谓为东方文化之代表”、“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等观点颇有价值。历来强调治史“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顾颉刚，大力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傅斯年也在《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文中说道：“‘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关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刻。作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御外辱的民族符号，黄帝崇拜达到了一个历史高潮，国人对“黄帝子孙”身

份的认同也空前坚定。正是这种团结自强的民族精神，鼓舞“四万万黄帝子孙”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延伸阅读

不论是文化认同，还是历史认同，都不自清朝始，它们萌发于先秦，弘扬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十六国、南北朝、西夏、辽、金，亦未曾间断。至近代以来，又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是中华民族之认同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意义。

——瞿林东《黄帝文化精神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